

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希望⁺

許倬雲^{*}



「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希望」——這個涵蓋六十年的大題目，要在短短四十分鐘內講完，是件幾乎不可能的工作。唯一可行的方式是依據我個人所知或所熟悉的範圍，取其大綱，等於是米家潑墨山水，而不是工筆細描，金線鉤皴、樓臺亭閣。好在今天在座的許多朋友都跟我一樣，曾親自走過這六十年的發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驗，都有自己的感想，讓我這個以個人為主的提綱，做為起點，或可使我們大家都做一番回憶；也許其中會有些許感慨，也許其中會有更多的反思。

一九四九年，中國分裂成兩邊，從此各自走各自的道路。分裂成兩邊後，每一邊都還多少有著過去遺留的傳統。實際上，兩邊皆是由一個崩潰破碎的基礎上，重建人文和社會科學

的研究。

先從我比較最熟悉的臺灣情況來說。我想先藉杜甫的兩句詩：「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來說明過去在大陸上曾經建立的一些人文社會科學的傳統，到臺灣來等於斷了線。一九四九年，在臺灣只有三分之二的史語所，小規模的臺大和師院，而政治大學還未復校。

這幾個單位，可以說是當年以研究為專業的園地，研究人員的總數，毛估不會過百。其中，經濟學在政府的經濟計畫單位裡可以看見幾個專家。法律學，只有臺大法學院少數幾位老教授。社會學的研究人員，不會超過五、六位。歷史學，史語所的工作人員，包括考古學在內，也不會超過十餘人。臺大的文學院，是

⁺ 本文係本院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五、十六日主辦之「近六十年海峽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慶祝許倬雲先生八十壽慶」主題演講內容。

^{*} 中央研究院院士、本院指導委員會委員。

靠史語所的同仁合作建立起來的。經學、文學研究，也只有史語所隊伍裡面的幾個人，以及臺大、師院的幾個人。人類學，還留在臺大和史語所之中，沒有獨立成所。我們這一代學生，就是在這麼少數老先生的教育之下成長。在座和我年齡相近的朋友們，大多是在這個地方、在這些少數老師的辛苦教導之下，完成學業，進而投入學術領域。

六〇年代開始有了轉變。派到外國去訪問的年輕學者，以及從外國學成回來的留學生，開始引進另一形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和觀念。譬如：

歷史學，從中國的典章制度和政治歷史的研究，逐漸轉變成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民族學和人類學，漢人的社會開始為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注意，於是它們不再只是研究少數民族的一個科目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由於土地改革和家庭計畫的需求，開始有若干田野調查。政治、經濟、法律……為了政府政策的需求，開始做若干調查，不過最重要的是將社會行為的觀念引進了社會學科。

六〇年代中期，政府為了十大經濟建設，不惜資金，力求訓練經濟學的人才，並在臺大設立了經濟學博士班。臺大的文學院也在歷史學科建立了博士班，為本地訓練人才的學程建立了一定的規模。海外歸來的幾個前輩學者，在中央研究院講學，將已經幾乎斷了線的語言學，重新在臺灣建立起來。實際上，他們建立的是新的語言學，和當年在大陸上專做方言調查已經不一樣了，有語音轉換、語法句法、語言結構等觀念，而且預伏了一條未來可以進行做為語言普及研究工作的線索。

在正式的研究單位之外，我同輩的幾個朋友們在六〇年代組織了「思與言」社，彼此交換不同學科的觀念和心得。這是一個完全自發性的民間組織，是促進臺灣科際交流和科際合

作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一群不同學科意氣相投的朋友們，互相切磋，使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開始呈現跨科際的交叉和彼此相互影響。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毋寧是將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結合在一起了。行為主義的經濟學和政治學研究，也當然是將社會科學的觀念帶進了這些本來各自為主的研究項目裡。在座好幾位同仁應和我一樣，都還記得當年每隔幾個星期聚會一次，聚會中大家熱烈討論，甚至爭論得臉紅耳赤，但是彼此都是很愉快的分手，預約下一次的見面聚會。青年時代，意氣風發，今天回想，我還是覺得能和這麼一批朋友論學，真是幸運之事。可惜這種多學科或科際之間的交流和合作，現在似乎斷了線，不知將來還能不能有恢復的可能。

七〇年代，有一批心理學和社會學為主的同仁們，提出學術本土化的主張。這個「本土」不是族群和地區的本土，而是從西方文化、傳統文化發展的社會學科中引申出能應用在華語文化環境的課題，將這些學科真正在中國的研究上紮下本地的根源，不必再搬弄一些外面的理論。我想，我們這一輩的朋友們，到今天仍懷著同樣的志願，希望能夠真正建立起一個超越西方文化範疇的人文和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尋找超越任何文化區域的研究主題。

可是，事與願違，後來因為出國的留學生越來越多，每一個人帶回來自己的師門觀念。各種宗派的思想，在海外的學校裡，其實代表著不同發展階段的衝擊和互動，並不是真正一條鞭的，但這些不同宗派的學生回到臺灣來，卻變成平面的互相隔離而不是對話。所以，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工作，反而因為更多的人投入社會人文學界，結果竟然是淹沒在全盤西化的浪潮之中。

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世界各地正經歷著

巨大的改變。在美國，從六〇年代開始寧靜的文化革命，改變了價值觀念，也改變了思考的角度。一切從樂觀、獨斷和積極，轉變成多元、容忍和相對。同時，西歐的「歐馬」（歐洲馬克斯主義）青年學者們，開始將史達林一系列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斯、恩格斯的主張分隔。歐洲馬克斯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同時也反對集權的社會主義和剝削的資本主義。拉丁美洲對於殖民者的反抗和指出東方主義弊病的薩伊德東方主義，結合在一起，開始要求自主，反對殖民主流、也反對西方文化的獨斷和霸權。

這幾個潮流的交纏，瀰漫世界各地，臺灣也不能免除於它的影響，產生了一定的衝擊。於是，在臺灣也一樣激起了像針對婦女、少數民族、弱勢族群……等新的文化研究。也就是說，這個對西方正統文化的衝擊與再思考，同樣也呈現於臺灣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界。例如，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又擴大為文化史的研究，注意到個人、小社區，也注意到個別的社群。更重要的是，歷史注視的對象，不限於菁英，而更多注意到庶民和弱勢群體，也注意到個人——因為個人也是必須注意的主體。

這時候，也正是臺灣政治開放的時候，新的本土論出現了。這次的「本土」，針對中國而非西方。他們一方面承受了上述文化結構和反抗文化霸權的背景，另外一方面又摻入了在地政治鬥爭的情緒。於是，在人文社會學科方面，毋寧發生了斷裂，一方是中國，一方是臺灣。這個分隔，比一九四九年的分隔還要來得深刻和嚴重。上一階段的本土論者，是追尋超越文化界線和藩籬的更高層統一，而這一次的本土論者是要從大的文化圈，孤立為一個完全屬於此刻此地的論述。可以說是要從共相、通相，走向殊相。

在這個環境之下，有另一個能量開始湧

現，那就是要在西方文化之外，尋找東方。這個「東方」不是西方界定的東方，而是東方自己尋找既定之東方。東亞的觀念，是十九世紀日本開始提出。日本藉這個口號，發動侵略戰爭，可是我們不能因人廢言，「東亞」這兩個字還是有它的意義。這意義在戰爭已經結束兩個世代之後的今天，確實可以平心靜氣的重新尋找東亞的內容，也許這個東亞的特色，足以和西方互相補足和互相融合，組成更高層次的人類文化。臺大高研院願意在這方面努力，也是我們工作的重點之一。

在討論臺灣一九四九年到今天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之後，我願意引兩句楊萬里的詩來說明：「危岸崩沙新改路，斷渠橫石自成橋。」意即在一切斷裂之後，我們需要從敗壞的基礎上找出自己的道路。

再回頭看一九四九年分裂以後的另外一邊，中國大陸。

眾所周知，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中國是在一個聲音、一個主義的約束之下，萬法齊一。新政權要求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人首先必須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堅持馬列主義的革命觀點，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此前舊社會培養出來的讀書人被劃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要求聽「黨的話」，向工、農、兵學習，進行思想改造，轉變立場、觀點、方法。繼一九五一年第一場思想改造運動中一些知名知識分子、有成就的教授紛紛痛自貶損，檢討自己的原罪、懺悔自己的過去之後，當局趁熱打鐵，在一九五二年按蘇聯模式進行了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藉機廢除了政治學、社會學等系科。理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打碎舊國家機器，一切服務於舊國家機器的學科必須掃除。新法律成為國家專政的工具，文學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人民」服務。歷史學和考古學的任務，則是設法證明社

會演化的階段。於是，革命以人民為芻狗，種種專斷，步步升級，到了文化革命，可謂登峰造極。數十年來，中國的學術界，一片肅殺，雲壓天低，大地冰封。人間春回，還需等到改革開放之後。

在這種情況之下，寒冬凍土下，卻已蘊藏生機。我們居然還能看到很多值得欣喜的發展。

首先，考古學者能夠在大陸上迅速發展，是因為要填補社會進化論的最初幾個階段。很意外，或不意外，中國變成了考古學的大國。中國今天的考古隊是世界最龐大的研究工作群。而考古學家們的發現，真的重新改寫了中國古代史，甚至於改寫了世界古代史。在資料增加到一定數量時，資料的內在邏輯和意義即自然呈現。於是，這麼多考古發現的文化，統統一起湧現時，我們開始發現新的詮釋。蘇秉琦先生將許多地方考古文化，以區系類型的觀念，建立了一個中國多元共同發展的歷史面貌。本來主要的任務是要解釋單線的文化演變，卻演變為呈現文化與文化之間接觸、交換和融合的擴大過程。中國的文化版圖原來是從許多個別的文化，逐漸融合成一個龐大而共容的個體。

同樣的，歷史學的任務本來是要證明中國社會演化的幾個階段，應當和官方的理論相符合。大陸的歷史學有「五朵金花」：古代史分期問題、歷代土地制度問題、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這些問題是為了界定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民族關係、農民革命和人物評價。但是，在這五朵金花的要求下，引起大家辛苦的去發掘資料，找出了無數過去忽略的資料，包括：各種公私檔案、隱藏的許多未為人知的農民革命歷史史籍、少數民族的文化內容、民間宗教分合與演化的過程等大批資

料。這些大批史料的出現，使歷史學者感激不盡，因為這些多是所謂「正史、官史」之外、沒人理睬而且幾乎快要被埋沒的材料，一下子被翻了出來，讓歷史學者有很多材料可以做新的研究。人民公社的公社運動時期，政府提倡社史、廠史、村史。在政府號召之下，同樣的，許多過去沒有人知道的材料被整合在一起，其中有些內容固然史料品質有問題，但無論如何這是過去沒有人管的工作，提供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甚至於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許多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材料。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地下發掘了許多先秦和秦漢的竹簡木牘，例如雲夢、青川，一直到郭店。這些材料大多是在中原之外的南方，它們的內容和中原經典化的古代思想史既有相同處，也有相當的差異處。這些新發現的總數量，已經相當可觀，使我們有機會重新理解中國在統一以前到統一初期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學者們有了這些材料，甚至對於詮釋正統經典都有極大的幫助。至於是不是能真正重建南方學術思想體系，恐怕還是有不夠之處。

改革開放以後，儘管當局仍然不放鬆防範思想自由化，但形勢跟過去定於一尊的局面很不相同。中國的人文社會學科發展一步步走向多姿多采，一些曾被廢黜的學科次第恢復，一些原屬禁區的新課題，由思想界討論異化開其端，而後繼之以市場經濟、三農問題等，應運而生。我以這二十多年來的情況，舉些例子：

在經濟學發展方面，為了要說明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為一獨特的形態，為了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學者們必須不把西方資本主義當作通例，而當作特例。有些學者必須要研究為什麼西方的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生。這個努力等於是把本來社會發展階段的單一線索，切成幾條線索了。另一方面，政府為了對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採取了許多經濟以外的手段。他們

必須注意到文化因素、社會因素，甚至於在經濟的範疇內必須要注意到貨幣以外的資源：土地、勞力、國內市場……等等。這種以經濟手段以外的宏觀調控，毋寧是另一種方式的行為主義者。所以中國在這一次經濟大崩壞、大恐慌期間，和紐約、倫敦的所作所為完全不一樣。

單位企業的出現和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很特殊的現象。這種發展是地方和社區可以在槓桿的一端，和另一端的中央與政權（政治權力）互動。這給了社會學和人類學許多活動空間，使我們看見許多新的社區調查。這些新的社區調查，一開始可能是為了實用而做的調查，但是發展到最後等於另外一種田野調查工作，幾乎重新銜接了當年費孝通和楊慶堃等前輩所留下的未完成的社會學。

另舉歷史學之例。北大和社科院的一群中古史專家們集體探討唐宋之間是銜接或是斷裂的課題。這本來是對日本「內藤理論」的測試，但後果卻也是對中古晚期的轉換有了一定的深入研究，而不只是敘述和褒貶。也就是說，這種課題趨向研究是中國歷史學界常見的，即使承受西方學術界以科技取向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也是能從實際材料上慢慢延伸出新的一些角度。

南京大學的歷史學同仁，對檔案的處理是延接了過去史語所、中大、金大的傳統。有一很突出的例子：一本研究毛澤東興起、獲得政治權力的書，幾乎完全用已經公開的官方資料一步步陳述毛澤東這個紅太陽是如何升起。更往南方，廣州的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本來都有人類學的傳統，它們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共同合作，也和歐美來中國研究的學者配合，正在努力建立地方史料、地方史研究的方法學，對某個地區，譬如泉州或是浦田地區做多方面的研討，整合經濟、外貿、宗教、宗族……等等，以求整體呈現於地方發展的全貌

和過程。

人文社會學科，大陸的研究一樣也接受了西方後現代詮釋的文化研究，例如，婦女研究、少數民族研究等等，都有學者投入，在各個方面發掘新的問題、新的材料，做新的闡釋。南大的一個研究隊伍，致力從馬克思的原典，糾正過去的誤解，尋找其原來的理論，也設法建構能和中國文化和歷史經驗相容的社會主義理論。從中國大陸的發展情況來看，似乎又印證了前述楊萬里詩句的隱喻，「斷渠橫石自成橋」，在幾乎崩潰的基礎上，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如今，兩岸學術界的合作，正一步步展開。以我所熟悉的課題來說，北大、社科院的同仁和臺灣的同仁，曾經訪查許多地方的碑刻，蒐集了許多民間的史料，從這些史料可以重現做為小型生活共同體的地方社會是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這種微觀地方史的工作，正好補足那種把中國做為一個大棋盤，大一統式的研究，成為另一可發展的大空間。

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也走向邊疆、內陸，不僅對少數民族和內陸地方有更多認識，而且從他們工作之中也找到了許多中國漢文化和非漢文化之間的互動。兩岸的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合作，正進行新的探討，例如南島語言的研究。他們從語言學找到一些線索，和考古學家找到的線索可以互相印證。如果這條線繼續走下去，南島語言族群的發展將不僅是海洋的故事，而是從大陸走向海洋的故事。東亞的大陸和東亞以外的海洋是一個大的整體，這個整體從北往南貫穿在一起之後，世界這半邊的歷史必須要重新撰寫，而世界人類活動的總面貌也會有全新的瞭解。

臺大、南大兩個學校的高研院，在這些課題上必定有很多學術同步進行的機會和需要。我可以想到的，除了「東亞」這個觀念更進一

步的釐清外，還有民族和文化認同的問題，更進一步還有人類和環境相處的問題。讓我們一步步走下去，我想，在兩岸真正合作無間的情況下，兩岸的人文社會科學隊伍將會一天天的壯大。今天，在科技掛帥的局面下，人文社會科學往往被當成弱者，但如果我們能真正拿出工作的成果，別人就不能把人文社學科學當成可以忽略的學科。謝謝各位。